

## 新聞賦權：一般婦女參與線上新聞公民平台 之初探性研究

林宇玲\*

---

投稿日期：105年3月27日；通過日期：105年10月3日。

\* 林宇玲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教授，e-mail: ylin@mail.shu.edu.tw。

本文引用格式：

林宇玲（2017）。〈新聞賦權：一般婦女參與線上新聞公民平台之初探性研究〉，  
《新聞學研究》，132: 61-106。

## 《摘要》

本文從性別化生存心態的觀點，檢視一般婦女進入新聞公民平台內其新聞賦權的可能性。藉由調查 18 位女性受訪者，本文有三項發現。首先，婦女參與新聞公民平台的動機不全然是為了新聞賦權，其中有些人甚至不太瞭解新聞的運作，只是單純想分享資訊。

其次，新聞公民平台雖然能讓婦女擁有新聞賦權的機會，但其參與新聞行列，仍須面對女性專業記者所遭遇的問題，包含外貌、體型、女性特質，甚或家庭的勞務分配等，這些性別因素都會限制並左右其新聞表現。

最後，性別化生存心態並非自動複製女性的附屬性，而是在進／出場域時，婦女不斷和場域的規則、資本及位置進行協商。

關鍵詞：女性、公民記者、性別化生存心態、新聞場域、新聞賦權

## 壹、前言

強調客觀、中立的「新聞」，過去一直被性別研究視為男性化文類（masculine genre; Paraneswaran, 2005）。儘管新聞業因婦女的加入，已逐漸改變新聞敘事的陽剛特質，但此改變並非全然拜女性所賜，而是媒體組織為了迎合閱聽人口味，獲取商業利益，不得不做出的權宜之計（Volčič, 2008）。這也導致新聞的女性化（feminization）被當成市場導向、非專業、不理性的負面產物，不僅報導未能改善女性形象，甚至助長新聞的性慾化（sexualization; Chambers, Steiner, & Fleming, 2004; Gill, 2007）。

同時，性別取向的新聞組織研究也發現，婦女加入新聞行業的人數雖然不斷攀升，但在新聞室仍處於不利的位置，多擔任中、低階的工作（Franks, 2013; North, 2014）。儘管新聞組織標榜「性別中性」（gender neutral），性別卻早已被嵌入組織的每日運作中，衍生出「性別隔離」（gender segregation）和「性別階層化」的現象：不僅在路線分配上，女性多負責軟性新聞，而且在升遷時也易遭遇玻璃天花板（glass-ceiling）效應，而持續擔任低階的工作（Lavie & Lehman-Wilzig, 2005; Lofgren-Nilsson, 2009; Robinson, 2008）。除了在勞務分配上容易遇到職業隔離與低薪待遇外，女性在人際互動上，也常須忍受男性對其外貌的品頭論足或性騷擾（賴維真，2003；蕭蘋，2004）。

顯然，婦女在現有新聞場域的表現，因「女性身份」而遭受諸多的限制，為了追求專業，有些女性選擇犧牲個人生活（如：晚婚或節育）；而已婚婦女則是承受雙重負擔（double burden），同時兼顧工作與家庭（孫志硯，2007；趙仲定，1987；賴維真，2003；North, 2014;

Santamarina, Ayerdi, & Fernandez, 2015)。面對女性加入新聞場域的困境，性別研究者除了要求新聞業反思「專業」背後所隱藏的性別問題外，也將改革動力放在網路科技上，強調網路有助於婦女在公共領域發聲、從事公民活動，甚至獲取新聞權力（journalistic power; Keller, 2011; Marzocchi & Bonewit, 2015）。

誠如 Chambers、Steiner 和 Fleming（2004, p. 239）所言，網路可以作為一種民主的新聞工具（a democratic journalistic tool），讓沒有受過新聞專業的婦女也能成為反抗公眾（counter-public），透過分享新聞技巧而產出另類新聞，對抗主流媒體的論述。而婦女在阿拉伯之春的線上表現，便是最好的例證。在 2011 至 2012 年期間，許多中東和北非地區的年輕女性利用社群媒體，一面成為公民記者張貼有關政治示威的訊息；一面對抗父權和威權體制，爭取女性權益。她們視公民新聞為一種數位賦權（digital empowerment）的形式，讓她們能成為媒體積極行動者（media activists），重新框架議題，動員民眾參與社會改革並成功獲得國際媒體對阿拉伯之春的關注（Gheyanchi & Moghadam, 2014; Newsom & Lengel, 2012; Radsch & Khamis, 2013）。

在人人都是記者的今日，公民新聞即是一種利器，能讓「無權力者」也能在公共領域發表所見所聞，即使內容不受好評或缺乏收視群，但依然發揮個人的能動性——主動參與新聞生產過程，並體現言論自由與民主多元性（Bou-Franch, 2013, p. 279）。Nip（2006）指出，公民新聞是由一般民眾自行蒐集內容、生產及出版的新聞產品。原本公民新聞的發展是獨立於新聞組織之外，不過隨著公民平台蔚為風潮，新聞組織也看到其商機，紛紛在旗下設立公民平台。有別於個人式或組織鬆散的公民平台，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仍受制於品牌定位和制度化程序的要求（林宇玲，2015）。正好提供我們一個機會用來瞭解：藉由新科技之

助，婦女進入新聞場域是否能感到友善而發揮報導所長？

目前有關公民新聞的研究，除了檢視公民新聞的內容和公民媒體的表現外，也開始探究公民記者的報導動機與產製行為，但鮮少從性別角度關切女性公民的新聞賦權問題，即：婦女為何和如何從事公民新聞的生產？是否能藉此突破公共領域對女性參與的限制與框架？

為此，本研究將回溯過去有關婦女與新聞研究的相關文獻，並從「性別化生存心態」（gendered habitus）的觀點切入，進一步瞭解女性為何進入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她們如何在場域內「定位」自身和面對場域的限制？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又如何影響其挪用性別資本，進行新聞實踐？

## 貳、相關文獻

### 一、婦女與新聞研究

新聞業過去一向與「男性特質」（masculinity）相連結，視男性利益為旨趣，以男性菁英為消息來源，並採用超然立場和客觀的報導方式來描述現實（Djerf-Pierre, 2007, p. 97），導致女性的觀點較少被呈現出來，且常以刻板方式再現「女性」形象，將其形塑成傳統（人妻／人母）角色、（性）暴力的犧牲者或性對象（Ross, 2007, p. 451）。

面對新聞報導的偏頗，美國報業編輯人協會（American Society of Newspaper Editors）將原因歸咎於新聞業缺乏女性所致，因此建議業者應雇用女性員工，將女性觀點包含進來，以促成新聞報導的多樣化（Ross, 2001）。早期女性主義者也認為，性別能影響新聞呈現方式。由於兩性接受不同的社會化，因此女性一旦成為「守門小姐」（Ms.

Gates) 將有別於「守門先生」(Mr. Gates)。

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男性被教導成價值獨立、以自我和目標為導向；女性則是價值依賴，以他人和關係為導向，導致兩性發展出不同的道德思考和關切：女性較易顯露情感、關心他人、更民主，也願意與人合作 (Rodgers & Thorson, 2003)。因此，女性進入新聞職場後，自然會出現異於男性的新聞表現：(一) 在議題選擇上，著重在人情趣味、消費或私領域 (如：家庭、健康) 的議題；(二) 在來源策略上，傾向以女性或少數團體為消息來源；(三) 在報導角度上，採用將心比心的報導方式 (如：同情)，並強調事件的脈絡與背景；(四) 在新聞專業上，看重讀者的需求與偏好，更甚於客觀的專業要求 (van Zoonen, 1998, p. 36)。如此的新聞實踐，已被稱為「女性化新聞學」(feminine journalism)，用來對抗新聞專業的男性化。

然而，隨著婦女大量湧入新聞業，似乎並未改變男性宰制的現況：女性依然多擔任初階 (entry level) 工作，且偏好採用男性價值去產製新聞 (North, 2009, 2014)。至於女性化新聞學的出現，也不全然是因為女性加入的緣故，而是受到新聞商業化和通俗化的影響 (Volčič, 2008)，導致女性化新聞學大受抨擊，不但新聞報導未能改善女性形象，甚至還助長新聞的性慾化 (sexualization) 並瑣碎化女人的觀點 (Gill, 2007)，同時再次鞏固男性在新聞室的專業地位 (Bonner & McKay, 2007; North, 2009)。

這顯示過去研究易將新聞報導視為性別特質的反映，而落入新聞—性別極化的模式 (Lavie & Lehman-Wilzig, 2005)。事實上，「性別」並非與生俱來的生理屬性，而是在權力脈絡中不斷地 (被) 建構出來，因此單純調查組織的性別比例是無法說明女性在新聞室的劣勢。de Bruin (2000) 因此建議，相關研究必須超越數據 (body count)，改採

究性別特質如何被具體化在新聞的生產過程中，記者的性別認同究竟如何與組織認同、專業認同進行協商。

Djerf-Pierre (2007)、Robinson (2008) 及 Schoch、Ohl (2011) 等人也試圖以生存心態一場域 (habitus-field) 觀點，解釋新聞場域如何複製婦女的不利位置。由於新聞專業是由男性價值所主導，強調競爭、公共性、客觀標準及超然立場，此和主流媒體的商業利益不謀而合，因而被嵌入組織的每日運作中，導致新聞室傾向男性化，而不利於女性的發展。婦女因為缺乏新聞場域的象徵資本，為了追求所謂的「專業」表現，自然會認同組織的安排，致力於第二次的男性社會化 (a secondary 'male' socialization; Gallego, Altes, Canton, Melus, & Soriano, 2004)，並誤以為新聞生產和性別無關。這也是為什麼當婦女成為資深編輯後，仍做出和男性一樣的新聞判斷 (Lavie & Lehman-Wilzig, 2005)。

儘管新聞組織多宣稱「性別中性」，但性別其實已被併入組織的運作中，而出現了性別隔離和性別階層化的現象。前者指新聞工作仍採用性別分類 (gender-typing)，依性別角色去區分男／女性的勞動參與。譬如：在路線安排上，男性負責硬性新聞；女性則是軟性新聞。後者則受到性別迷思的影響，認為女性無法勝任主管一職，加上有家庭的牽絆，對工作較不投入（如：遇到突發狀況時，無法立刻行動），所以女性在升遷時，容易遇到玻璃天花板效應，而持續擔任低階工作 (Lofgren-Nilsson, 2009; North, 2014; Robinson, 2008)。

除了新聞的勞務分配不利於女性發展外，在人際互動上，女性也常須忍受男性對其外貌的指指點點或性騷擾，尤其在電視台，女性的外貌遠比專業經驗更常被拿出來評比。Milivojević (2016, p. 31) 因此指出，「新聞產業以性別歧視、玻璃天花板效應及其他的性別排斥作法，再次複製著相同的現實。」

婦女在新聞場域因「女性身份」而遭受種種限制，不論是性別偏見、次等職務、升遷受阻或性騷擾等，不僅影響其在職場的工作權益，甚至更廣地影響女性在公共領域的整體表現——由於新聞與公共領域有密切的關連，一旦女性長期處於次等、不重要的新聞位置，將會削弱或邊緣化女性在公共領域的聲音，導致婦女的處境性知識與經驗不被重視，同時也易忽略女性相關的議題與主張。這也是為何性別研究者一直關注婦女在新聞媒體的表現。

## 二、婦女與新聞賦權

如前所述，婦女在新聞場域一直處於劣勢，性別研究者除了揭露新聞產業的壓抑結構外，亦試圖尋求其他的賦權方式（如：另類媒體），讓女性能藉此發聲，改變處境。

所謂的「賦權」是一種改變的過程，從無權力（powerlessness）的狀態，轉變到對其生活、命運及環境擁有相對的控制權（relative control; Sadan, 1997, p. 144）。Kabeer（1999）指出，對婦女來說，賦權乃是讓她們成為能動者，有能力近用資源、做出選擇並達成目的。顯然，賦權不是抽象的心理狀態，而是藉由具體行動，讓婦女擁有知識和資源去追求最好的利益，反轉其劣勢。在新聞場域亦是如此，婦女可以藉由行動，除了獲取專業資格，進入新聞場域內進行協商外（Mello, 2010），也能利用另類媒體，在沒有任何專業背景下獲得新聞權力——自由出版和產製新聞內容（Atton, 2008）。隨著新科技的普及，婦女經由後者的新聞賦權，也變得更加容易。

儘管如此，目前有關婦女作為公民記者的討論還是相當有限，大多數的研究仍以廣義方式調查網路如何賦予一般婦女傳播權力

(communicative power)，讓她們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主動的公民權 (active citizenship)、自由尋求和分享資訊、表達政治觀點、建立社群網絡、甚至動員民眾從事公民活動或社會運動 (Gurumurthy & Chami, 2014, Huws, 2008; Keller, 2011; Marinescu, 2008)。

至於女性公民記者的研究，則多以個案檢視婦女如何利用另類媒體 (如：部落格、臉書、公民媒體等) 生產異於主流媒體的新聞形式與內容，促成社會改變。以阿拉伯之春為例，在中東地區的婦女因受限於傳統角色，不能像男人一樣拋頭露面走上街頭，許多年輕婦女因此加入公民記者行列，以社群媒體發表有關政治、示威的訊息；有些女性甚至以英文書寫公民新聞，藉此讓更多國際媒體瞭解中東情勢與改革目的 (Al-Natour, 2012; Newsom & Lengel, 2012)。

這些婦女被稱為「網路積極行動者」(women cyberactivists)，利用公民新聞作為有力的賦權形式，發揮能動性、擴大聲音並參與社會改革。除了重新定義公／私領域，連結個人與社會政治外，她們也向外 (externally) 成為國際媒體的重要消息來源者，成功挑戰宰制媒體的論述，讓婦女聲音出現在公共領域，擴大婦女的影響力，爭取社會和女性權益 (Radsch, 2013; Radsch & Khamis, 2013)。Gheytauchi 和 Moghadam (2014) 認為，這些婦女作為公民記者至少達成兩項成果：一是她們所張貼的訊息已改變議題被框架的方式，重新形塑公眾議題；二是透過線上社群將議題快速擴散出去，不僅分享訊息，亦提供跨界對話和討論，藉此提高婦女的政治機會，同時對抗宰制媒體和父權體系。

不過，Newsom 和 Lengel (2012) 也指出，公民新聞雖然是有力的賦權形式，但仍是被限制的 (contained)。由於中東婦女為了安全著想，多以匿名化身的方式發聲，因此新聞賦權似乎只限於網路空間，而難以轉換到線下。顯然，婦女在賦權的過程中，仍會遭遇一些阻礙與限

制。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公民記者不同於專業女記者，她們不須受限於媒體規範或組織利益，而是能以自己的觀點和風格書寫新聞，並在重大事件時扮演改變策動者的角色，透過線上串連擴大其影響力。就此而論，公民新聞的確有助於提升婦女的媒體能見度（*media visibility*），讓缺乏新聞專業的婦女也能在公共領域發聲和被聽到。但，個別婦女在新聞賦權的過程中，是否都以相同的方式被賦權？目前相關的研究傾向將「婦女」視為同質性的「女性群體」，因此無法窺知：個別婦女在生產公民新聞的過程，是否擁有或近用不同資源、做出不同選擇或遭遇不同限制。然而，賦權涉及個人的轉變過程，就如同 Atton（2008, p. 213）所言，一般民眾的新聞賦權會受其生存心態影響，不論是他們的價值、動機、態度、教育、歷史、關係等等，都會影響其在新聞場域的媒體使用和新聞生產。為此，本研究將以「性別化生存心態」的觀點，深入探究一般婦女如何利用公民新聞平台從事新聞實踐，以及她們所可能遭遇的限制。

### 三、性別化生存心態

過去女性主義雖然強調性別的建構性，但偏重在「象徵識別」（*symbolic identification*）的過程，傾向關注論述的表達層面，而忽略認同的無意識和形體化（*embodiment*）層面（McNay, 2000, 2003）。為了避免高估個人的解放潛力，McNay 試圖以 Bourdieu 的「生存心態」，並從性別角度重新檢視結構和能動性之間的關係。

Bourdieu 的「生存心態」概念，涉及結構／能動性、客觀／主觀、鉅觀／微觀之間的辯證關係。他將生存心態定義為，

…生存心態，是持久、轉換的稟性（dispositions）系統。被建造的結構（structured structures）預作為建造的結構（structuring structures），亦即作為生產的原則（principles of the generation）和實踐與再現的建造，能客觀地「被管控」並「有規律」（objectively “regulated” and “regular”），但不是遵從任何規則的產物；能客觀地適應其目標，但不是有意識地瞄準目的或想掌控運作去獲得它們；以及所有這些集體地被合奏，但不是經由指揮家指導演奏的產物（Bourdieu, 1977, p. 72）。

生存心態包含「被建造的結構」和「建造的結構」。前者是個人長久以來面對外在結構（如：家庭的社經結構或階層化的性別關係）的刺激而不斷調適，並加以內化的產物，因此生存心態在某程度上也反映出個人所處的社會條件。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從小便在家中習得二元的性別分類／看法（di-vision）<sup>1</sup>，經過不斷地體驗，逐漸掌握身為男／女人應有的稟性、行為舉止、說話方式、穿著打扮等，而發展出性

---

<sup>1</sup> Bourdieu 在《Masculine Domination》一書中（2001）指出，在父權社會的性別關係是支配和被支配的階層（hierarchical）關係：男人支配、女人順從，並透過象徵暴力維持如此的宰制。由於性別以二元、對立且非對稱的形式展開：男性特質被建構成權威的陽剛性、女性特質則是缺乏男性特質（a lack or an absence of masculinity）的陰柔性，如此的象徵暴力施加在個人身上，讓個人誤以為（misrecognition）男性特質／女性特質是自然的個人稟性（Powell & Sang, 2015, p. 921）。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家」是建構且維持性別的重要場域（Bourdieu, 2001, p. 85），兒童是性別化的（gendered），從小便被嵌進性別的權力關係中，不斷學習外在對其性別的要求與評價，並採取適當的性別特質來回應，進而複製了既存的性別秩序。雖然 Bourdieu 的性別觀點被批評過於簡化，但不容否認，性別作為「生存心態」的確有助於說明個人如何成為性別化的主體，同時男性特質為何總是成為有價值的資本，且能被轉換「象徵資本」（Miller, 2014）。

別化生存心態，建立男／女性別特質，身體也因此成為重要的形體化文化資本（embodied cultural capital; Wade, 2011）。

「建造的結構」則指「被建造的結構」讓個人瞭解到成功／失敗、可能／不可能的機會結構，並形成其認知與期望，讓他們在特定情境做出某種反應與行動。不過，行動並非預先被決定，而是充滿模糊與不確定性——亦即，個人對場域所提供的機會與限制，做出策略性的即興演出，此可能強化或修正「被建造的結構」。譬如：婦女在男性宰制的新聞室內，有人選擇隱藏女性特質，並以男性為前輩，加入硬性新聞的報導行列；有人則利用女性特質去開發軟性議題或負責副刊（Lofgren-Nilsson, 2009）。

Bourdieu（1990, p. 52）試圖以「遊戲的感覺」（feel for the game）來說明生存心態是一種生產原則，而不是決定性的結構。以打網球為例，網球選手雖然早已習得相關的技能，平日也不斷地練習，但在比賽時，仍會出現不可預期的反應與打法。然而，當下的實踐即使是自發性的（spontaneous），卻又超越現在的立即性（immediacy），因為個人動員了過去經驗和對未來實踐的預期，然後用身體將其體現出來（Bourdieu, 1992, p. 138）。由此來看，實踐乃是生存心態的產物，同時包含結構的限制和個人的能動性。

此外，為了強調生存心態不是採用有意識、認知的論述形式發展，Bourdieu 也以「無指揮家的演奏」（conductorless orchestration）來解釋生存心態如何以「前反身性」（pre-reflexive）、形體化的實踐方式體現在身上（Swartz, 1997, p. 105）。在社會化的過程中，個人的身心同時受到外在結構的教化薰陶，不論是想法、感覺，或是肢體動作、行事風格、品味偏好等，在在顯露其所屬的階級特性（Bourdieu, 1984）。當然，性別亦是如此，男性被教化為果敢、主動、領導、理性、獨立；女

性則是愛美、被動、順從、感性、合作。McNay (1999) 指出，相較於階級，Bourdieu 較不重視性別化的生存心態，雖然他也曾探討男性宰制的問題，但並未將性別化生存心態放入場域內分析，導致其性別概念過於僵化。

Bourdieu (2001) 認為，性別差異是象徵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的效果，而男／女性特質在這過程中，被視為正／負面的象徵資本，嵌進男／女身上，成為客觀的分類系統，並被知覺為理所當然。這種認知效果 (即 doxa) 讓原本武斷的社會差異變得自然化，從而鞏固社會上的性別分工 (如：男性支配／公領域、女性附屬／私領域)。

根據 Bourdieu 的說法，性別運作似乎是牢不可破，但此並不符合理想社會的兩性發展。不過，McNay (1999, p. 103) 也意識到，在去傳統化的今日，性別關係的某些部分 (如：勞務分配、婚姻等) 雖然可以被重新協商，但某些前反身性的面向 (如：性慾、母性) 卻無法輕易被重塑，例如女性總是習慣為他人著想。Robinson (2008) 即發現，婦女進入新聞室內，經常扮演母性角色 (mothering roles)，如安慰同事或自動接聽電話。

McNay (1999, 2000) 因此指出，Bourdieu 的生存心態的確讓我們注意到性別認同中根深蒂固 (entrenched) 的一面，但必須從場域著手，才能瞭解性別化的個人如何在客觀結構內，不斷地協商其性別認同。

#### 四、性別化生存心態、性別資本及新聞場域

性別化生存心態的養成依賴場域。雖然所有場域皆深受主流性別規範的影響，但每一場域仍有其獨特的運作方式，因此性別規則的設定也

隨著場域的變換而異。當個人進入某一場域，其性別化生存心態會對場域的要求做出回應、調整，甚或改變（Chambers, 2005）。一方面，性別化生存心態允許個人根據自身對性別的體驗或瞭解，在場域內挪用各種資本，尤其是「性別資本」（gender capitals）而行動；另一方面，個人在場域內的行動或實踐，也會回頭影響其性別化生存心態的重塑。

Bourdieu（1986）以為，場域內蘊藏各種形式的資本，包含經濟資本（如：錢財）、社會資本（如：關係網絡）、文化資本（如：知識和能力）及象徵資本（如：職稱）；其中，文化資本又分為客體化資本（如：文化物品）、制度化資本（如：證照）及形體化資本（如：稟性）。對 Bourdieu 來說，資本似乎是不分性別的，所以他偏重在檢視資本對階級優勢（class advantage）的影響，而未深究資本和性別的關係（Huppatz, 2009）。

McCall（1992, pp. 843-845）指出，性別不僅是決定社會位置的重要、隱藏性（hidden）因素，也是一種文化資本——因為性別是由個人在社會化過程中所習得的性別稟性（gendered dispositions），並體現在其身上。性別作為形體化的文化資本，其重要性不亞於其他形式的文化資本。以女性進入男性主宰的職場為例，她的外貌出眾可能比擁有證照更能為她贏得機會；但若其身兼母職，則可能阻礙其升遷。由此來看，婦女在場域的表現，也常受制於資本的性別化形式（gendered forms of capital）。

為了掌握婦女的性別化實踐，Huppatz（2009）將性別資本細分為二：（一）女性資本（female capital），指因擁有女性身體而取得性別優勢；（二）女性化資本（feminine capital），指經由社會化過程而習得女性化稟性（feminine disposition）或一套技巧，但也可能只是因為擁有女性身體而被視為女人（Huppatz, 2009, p. 50）。儘管婦女因性癱化

身體 (sexed biological bodies) 而擁有女性資本，但她們未必會採用女性化資本，特別是在職場上，多數婦女可能會放棄女性化資本，而選擇體現男性化特質。這是因為男性化資本 (masculine capital) 在公共領域上能被轉換為象徵資本，讓她們的行動受到肯定；相反，女性化資本則易限制或貶低其行動的意義 (McCall, 1992, p. 846)。由於女性／女性化資本的象徵價值較低，導致其使用價值也變得有限，它們無法成為策略性的工具 (strategic tool) 用來顛覆權力 (overturn power)，只能讓婦女以戰術性 (tactical) 的方式用來操控限制 (manipulate constraints; Huppatz, 2009)。換言之，女性／女性化資本總是在限制底下運作，婦女只能利用事件來轉換成機會 (Skeggs, 1997, p. 10)。

尤其在非女性化的場域 (non-feminine fields) 中，男性／男性化資本具有象徵合法性 (symbolically legitimated; Huppatz & Goodwin, 2013)。雖說性別資本並非本質性，卻仍連結至身體，導致婦女一旦進入該場域，即需面對女性形體 (即女性資本) 的限制，她們可能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挪用性別資本 (包含女性化和男性化資本) 為其累積更多其他形式的資本，以進行「象徵抗爭」 (symbolic struggles)，鞏固其在場域的位置；而新聞場域便是其中一例。

如前所述，新聞場域是由男性價值所主導，婦女一旦進入該場域，即須進行「象徵抗爭」，為了獲得接受與肯定，大多數的女性會認同組織的安排，致力於「第二次的男性社會化」；不過，有些婦女也善用女性化資本，意圖發展「人本」或「心理導向」 (psychology-oriented) 的報導風格 (Schoch, 2013)，或交錯採用男／女性特質——有時採用客觀報導，有時則是女性化的風格 (Schoch & Ohl, 2011)。根據相關研究顯示，婦女在新聞職場所採用的性別策略，至少有三種：

(一) 採用競爭策略：婦女拒絕其女性特質，以「男性特質」作為專業

的象徵，並採取男性的行事風格。為了和男性一較長短，婦女也努力累積其資本，包括專業教育、人脈及關係。Djerf-Pierre (2005) 即發現，資深女編輯為了平衡其性別所帶來的負面資本，而比男性更依賴社會資本（如：前輩或良師）。

(二) 善用女性特質：婦女肯定自身的女性特質，認為細心、敏銳或善於溝通等，讓她們更適合從事新聞工作（蕭蘋，2004）。有些婦女也利用女性特質作為資本，專注在人情趣味、軟性議題上，或擴展新的報導類型（如：消費環保議題；Djerf-Pierre, 2007; Schoch, 2013）。

(三) 做出女性主義的反應：受到性別平權的影響，有些婦女發展出性別意識，主動反抗宰制的男性觀點，並致力於呈現另類聲音與意義（North, 2004, 2009）。

儘管婦女面對新聞職場的要求不是逆來順受，但仍需承受許多結構性的限制。隨著網路科技的普及，新聞場域的發展也有明顯的改變，新聞組織正逐漸打開守門機制，開闢社群媒體、公民平台，讓一般民眾也能加入新聞生產行列。這對婦女來說，無疑是一契機。過去因為專業守門，而讓婦女在新聞場域不能大展身手，一旦少了守門機制，女性近用新聞產製的機會可能因此而增加，甚至有助於擴大女性的觀點，抑或進一步挑戰傳統新聞的規範與慣例。

為此，本研究將從性別化生存心態著手，調查女性／公民記者的新聞賦權——當她們跨入新聞場域，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公民／新聞實踐之間互相形塑的過程。問題包括：女性／公民記者為何進入新聞場域？在新聞公民平台中如何定位自身，並面對場域的限制？當察覺場域的限制，她們如何挪用性別資本打開機會？又如何藉由從事公民新聞實踐，重塑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帶來轉變？

## 參、研究方法

有關公民新聞的定義，眾說紛紜。Bowman 和 Willis (2003, p. 9) 將公民新聞定義為，「公民或公民團體在新聞和資訊的蒐集、報導、分析及傳遞過程中扮演主動的角色；其參與的意圖是為了提供民主所需的獨立、可靠、正確及相關的資訊」。Goode (2009, p. 1288) 則表示，公民新聞是由一般人參與以網頁為主的新聞實踐，除事件報導、影音分享及評論外，也應包含後設新聞 (meta-journalism)，如轉貼、連結、標籤、設立關鍵字、評分或修改等。由於本文欲瞭解婦女能否藉由參與公民新聞的產製而進一步新聞賦權，因此採用前者的定義，以使用者主動生產的內容為主，包含公民報導、影音分享和評論。

為調查女性加入新聞組織所成立的公民平台，其性別化生存心態對公民報導、角色定位及新聞實踐的影響，本文採用深入訪談法。訪談問題的設計並未特別針對「性別」發問，因為性別化生存心態涉及無意識的層面，本文希望透過一般性問題，讓受訪者自然地回答在新聞場域的經驗與感受，以瞭解性別是否、又以何種方式影響其新聞實踐。

本文於 2014 年 1 月初至 7 月底期間，針對曾在各家新聞公民平台上發表過文章的公民記者進行邀約，共取得 18 位女性的回覆（見表一）。訪談主要以面對面訪問進行，但有些受訪者因不願意接受面訪，而改用電話訪談或電子郵件代替；受訪時間從 40 分至 3 小時不等。由於有些受訪者不願具名，本文皆以編碼代替。

表一：深度訪談對象表

訪談對象	主要參與的新聞公民平台	年齡	學經歷
F1	PeoPo	23	日文系、政治系畢
F2	PeoPo	68	高中畢
F3	上下游	未提供	新聞系畢
F4	上下游	26	農化研究所畢
F5	上下游	約 30	城鄉所畢
F6	新頭殼、上下游 PeoPo	約 50	護專、空大公共行政系
F7	新頭殼、PeoPo	60 以上	碩士畢
F8	WNews	54	食品營養科畢；曾任國中行政人員、曾為聯合報副刊寫作、TNN 特約記者
F9	WNews	43	中文系畢、家庭主婦
F10	WNews	37	二專畢、曾在銀行和不動產業服務
F11	Wereport	32	廣電系、社會學研究所畢；曾在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九五聯盟服務
F12	Wereport	26	新聞研究所、東森財經實習
F13	Wereport、新頭殼、PeoPo	21	大傳系、曾任學校實習報文字記者、學校新聞研習社社長、商業周刊數位內容編輯部助理編輯
F14	苦勞網	31	社會系肄業、心理研究所畢、曾在 2009 野草莓學運結束後發行刊物、曾任桃園縣產業總工會的行政職
F15	苦勞網	未提供	大學性別所任教
F16	苦勞網、社會主義者	25	香港的文學院畢，雙主修哲學、社會學
F17	iReporter、Global Voice	25	新聞所畢
F18	論盡澳門街、愛瞞日報、評台、兩岸公評網	24	新聞所學生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 肆、研究分析

### 一、參與公民報導的動機

來自各行各業的 18 位女性受訪者大多受過高等教育（見表一），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如：特殊專長或敘事能力）和興趣（見表二）。由於公民新聞缺乏經濟報酬，因此她們從事公民報導主要是基於「非經濟」的考量，如 F7 在偶然的機會下接觸了公民新聞，「我覺得退休以後不在職場，就要學一些東西，看是不是可以讓生活更充實，所以我就去社大，那有機緣就上了公民記者的培訓課。」從訪談中發現，50 歲以上的受訪者多是經由社區大學的課程，才立志成為公民記者。

我目前還在工作，就是利用工作之餘，在民國八十九年的時候，朋友告訴我台北有一個社區大學，就在我家附近，因為我要彌補我沒有升大學的遺憾才去上課。後來，好像是民國九十六年，公共電視在社區大學有公民新聞的培訓課程，然後我就正式加入南港公民新聞社（F2）。

而 30 歲以下、具有傳播相關科系背景的受訪者，則多因為學校作業的要求才接觸公民平台。如 F17 說：「當初有一門課，老師是聯合報的資深記者，剛好聯合報正在做公民新聞，所以他就沿用這個平台讓我們把完成的作業放在 iReporter 上。之後，我又接觸了全球之聲，就是 Globe Voice，成為它的編譯，但好像也只試過一次。…我並沒有以一種公民記者的身份在做，比較常是以一個公民的形式去參加。」她們大多認同公民平台的公民參與，但較少志願為公民記者。

表二：受訪者的專業背景和敘事特色

研究編號	參與的新聞公民平台	專業背景	從事公民記者年資	報導關注議題	敘事特色
F1	PEOPO	報社編輯	約7個多月	社會運動、環保	以客觀角度且標準新聞形式書寫，採圖文形式。
F2	PEOPO	自營業(公司負責人)	6年9個月多	議題多元，以軟性為主。	圖文影音形式，開始會自行配音，多以第一人稱書寫，偶出現第一或二人稱，偏愛軟性新聞。
F3	上下游	自營業(作家)	1年多	議題多元，以軟性為主。	圖文式，以第一人稱散文式書寫，透過與各國人士用餐或食物從中介紹文化。
F4	上下游	自耕農	半年	農業	圖文式，以第一人書寫個人農業生活。
F5	上下游	好食機創立者	2年10個月	農業、畜牧	圖文式，以第三人稱書寫，文章與民生、飲食、畜牧相關。
F6	新頭殼 上下游 PEOPO	護理工作	2年	議題多元。農業、文化、社會正義、佛學為主要。	圖文式，字體為標楷體。多為第一人稱書寫。特定名詞或人名會使用超連結。
F7	新頭殼 PEOPO	退休	6年多	議題多元。	未有固定形式，以第一人稱書寫，外連資料多、影音不剪輯，轉引他人資料多半全文轉貼。
F8	Wenews	食品營業	3年	美食、旅遊	文字(第一人稱、三人稱)、攝影
F9	Wenews	自然保育	3年	美食、旅遊	文字(第三人稱)、攝影

(接下頁)

研究編號	參與的新聞公民平台	專業背景	從事公民記者年資	報導關注議題	敘事特色
F10	WEnews	銀行和地產業	3年(2010年6月起)	美食旅遊	第三人稱，圖和文
F11	Wereport	社會運動	5年	社會運動	影像
F12	Wereport	傳播	2年(2013年10月)	體育	影像(寫法：第三人稱)
F13	Wereport、新頭殼、peopo	傳播	2年(2013年開始)	社區發展、社會運動	文字為主 (寫法：第一人稱，第三人稱)
F14	苦勞網	社會運動	7年	勞工、社會運動	文字為主的報導、評論(第三人稱)
F15	苦勞網	性別、左派批判	3年(2012年開始)	性別	批判性評論 (寫法：第三人稱)
F16	苦勞網	社會運動	2009年起	左翼評論、女性、勞工、媒體壟斷、香港	批判性評論
F17	iReporter Global Voice	新聞傳播	2007年、2011年	國際新聞	影音
F18	論盡澳門街 ALL ABOUT	新聞傳播	4年	性別和澳門政治、藝文	批判性評論

此外，有些受訪者則表明支持社運或關切社會議題；對她們來說，參與公民報導除了表達個人意見外，更是為了增加議題的曝光機會。如 F11 指出，「對 NGO 來說，我們需要曝光、需要露出嘛，像找 Wereport，從募款的時候其實就開始行銷我們的議題，就是把議題燒下去。」F14 也說：「像東門市場那時候明明就很慘，他們也沒時間來，然後我就很急很急，因為那些要被強拆的阿伯和阿嬤，他們怎麼可能自己有管道去指導媒體，他們就是因為沒有人際關係、沒有政商關係，他們才會淪落到這樣啊，然後我那時候就有認清一件事，就是如果我要讓這一件事曝光，我只有自己寫了。」這些受訪者本來就熱衷於社會參與，具有高度的社群意識，她們察覺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是一個「公開」的管道，不僅使用者可以自行設定議題，也能藉此吸引更多觀眾或志同道合者，擴大議題的影響力，進而讓媒體和政府關注。

不過，也有些受訪者是因為公民平台的邀約，才開始加入新聞場域。如 F5 說：「我們就是長期關注畜牧這樣的議題，接觸比較多農民，寫了一些故事，然後上下游就來邀，因為是比較早期，它剛開始成立的時候就有。」F15 也憶起，「兩年前發生台鐵事件，就是化名小雨的這個青少女跟八個男子包了一個車廂，然後我就寫了一篇就是簡單的一兩千字，放在自己的臉書上。當時苦勞網認識的朋友看到就覺得很適合…然後就變成一個類似論壇、新聞評論的文字，這是第一次。」受邀的受訪者大多對特定議題較關注且有獨到之見，才被新聞組織網羅；之後，她們也持續在公民平台上發聲。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女性受訪者進入新聞場域的機緣不盡相同，有的是誤打誤撞；有的是被要求或是被邀請；有的則是主動出擊。不論她們在公民平台上發文是基於何種動機，這些受訪者皆意識到公民平台不同於臉書或部落格，除了提供一個發言管道，讓她們可以掌握話語權

外，同時也提供一個有力的場域，讓她們可以認識更多人，擴大輿論的影響力。

## 二、對場域的認知與定位

來自不同背景的婦女在進入新聞組織的公民平台後，並非全部坐入「公民記者」的位置。在 18 位受訪者中，F4 和 F5 從未聽說「公民記者」一詞，如 F4 表示，「我是第一次聽到公民記者這個詞彙，我想是不是分享自己所看到的？」她們都是【上下游新聞市集】的作者，本身缺乏傳播相關的知識。儘管【上下游】平台開放新聞空間讓民眾上網 po 文，但此平台不同於 Peopo，以「作者」來稱呼使用者，以致 2 位上下游作者對「公民記者」或「公民新聞」感到陌生。對她們來說，選擇【上下游】不是基於對新聞的興趣，而是為了分享農業資訊或關切食安問題。

而其他 16 位受訪者則以為，「公民新聞」是一般人所製作的新聞報導，如 F1 說：「公民新聞是不會受到外力影響，純粹是你自己想寫什麼、想關注什麼就去寫。」但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公民記者」的身分。其中，F3、F12、F17 及 F18 雖然認同公民記者的無私付出，但自覺其所做的報導仍有限，而無法被稱為公民記者。

我覺得公民記者要不就是長期推動某個議題，像我就不符合公民記者這塊，我有個專題需要研究、深入探討，這個比較偏向課堂。我想要募款才會到 Wereport，所以我不是公民記者，只是推動一兩次就感覺還好（F12）。

我很少做題材性的報導，而且我寫的評論、辦的活動都不是很

深入、很專業，有時我還覺得有點兒戲。就我現在的狀況，沒什麼讀者、也沒太大影響力，寫寫專欄評論那些，頂多就是稍為被人知道的一名作者，距離『公民記者』還有點遠（F18）。

這 4 位受訪者認為，公民記者雖然是業餘，卻是長期關注某些社會議題，而不像他們偶爾為之。另外有 3 位受訪者則表明，不願意成為公民記者。F9 指出，「我現在的名片就是印公民記者、部落客，下一版就會拿掉公民記者，因為這沒有加分，而且重心比較放在部落格，部落格帶來的效應大多了。…通常是店家有要求多一個曝光平台我才會放 WeNews，不然還是以部落格為主，因為部落格的效益較好，又可以累積人氣。」對她而言，公民報導只是一種個人曝光的方式。而 F14 和 F15 則因質疑「公民」身份，不願成為公民記者。

我其實對公民這兩個字滿『賭爛』的，因為就是當以前聽到公民這兩個字的時候，他總是跟某種有自覺的人，或是有理性而且會分析的人，或是說有自覺會去改變自己生活的人的形象綁在一起，可是我很討厭會這樣子標榜自己的那種人（F14）。

我對『公民』這個位置很質疑，所以我既不覺得自己是記者，也不贊成只用『公民』來描述自己…我不喜歡現在公民社會這樣有一種新的公民想像，就好像遊民也是公民，這不是很奇怪嗎？你就會知道公民本身是有門檻的（F15）。

這 3 位受訪者不論是基於經濟考量，或是出自批判意識，都未接受社會所賦予「公民新聞」或「公民記者」的民主意涵，而主動拒絕此位置，並以自覺的方式在公民平台上進行新聞實踐，或 po 文、或報導、或評論。

除上述 9 人外，其餘 9 位受訪者則聲稱自己是公民記者。如 F6 說，「我當公民記者的目的就是要凸顯一些大家忽略的議題，那些議題可能是沒人要報、沒人要寫，再來就是沒人提出的觀點，我就是把它寫出來。」F8 也表示，「我自許是公民記者！公民記者沒有收入、不收受費用和禮物，所以可以公正地做新聞報導...用不同於職業記者的角度報導，就是一般人的觀點。」

而從事社會運動的 F11 也指出，「我是連著社運團體，當然就是爭取把議題露出的機會。我覺得公民新聞就是讓基層人民可以表達他的意見，我們應該鼓勵啊！現在科技也越來越進步，手機、iPad、平板阿，它們都可以做成新聞，那新聞就不會被國家跟財團壟斷！」

這些自許是公民記者的受訪者，對目前媒體的表現極為不滿，認為身為「公民」就能夠並也應該成為公民記者，利用自身的「獨立」與「自主性」來改變現狀，彌補媒體報導的不足。F13 說，「有人問我：『公民記者需要什麼特質？』，我就說：『我就是公民記者啊！』我很好奇為什麼我不是？...我就在現場啊，我正在做記者的工作，我用我的親身經驗把它記錄下來。我覺得輿論已經很不公平了，我必須把我看到的寫出來，讓大家知道。」

由上可知，儘管所有女性受訪者都曾在公民平台上發文，不論是發表意見、評論或上傳新聞，但不是所有人皆認同公民記者的身份，有些是因為不瞭解；有些則自認為不稱職；有些卻是對公民身份的反感。透過她們對自身發文的定位，有助於我們瞭解當婦女參與「公民新聞」的產製，她們並非坐入相同的位置，對「公民記者」的想像也存在著許多差異。

### 三、從事公民報導的限制

新聞組織雖然鬆開了守門機制，但公民新聞的品質仍被質疑，導致其多成為資訊來源（source of information）或補充之物（Corrêa & Madureira, 2009）。而公民記者也因缺乏專業資源（如：記者證、媒體曝光率、官方資訊或記者薪資等），在新聞場域內多處於邊緣的位置，此對女性來說尤為不利。在訪談中，女性受訪者也多察覺性別所帶來的種種限制。

首先針對體型，不論年紀大小，從事公民報導的女性受訪者皆指出，女性的體型嬌小，不利於現場採訪。F11 憶起參加洋華工會鬧場的事件，「那個時候很多媒體，他們會把我撞開…他們看我拿 DV，可能會覺得我不是記者，因為我也沒有那麼有名，那些攝影大哥，他們每一台機器都比我大，每一個都長的比我高，害我都拍不到，很不開心。」68 歲的 F2 也有類似的經驗：「我長那麼小，然後拿的機器也不像他們扛在身上，他們會說：『欸！大姊你擋到我了。』明明位置就是我先到的耶，你不能說我是女的，我就不能跟你們站在一起！」

在新聞場域內，搶拍的攝影工作符合刻板的男性特質，被連結至男性身體，由男性負責；而女性則多擔任文字採訪記者。然而，公民記者通常是多工任務——一人既要負責採訪，也要拍攝和後製剪輯，所以對女性公民記者而言，她們的性別（若再加上年紀）在現場就顯得有些突兀，而易遭受排擠。儘管如此，以「公民記者」為己任的女性，為了採訪工作，也只能提早到現場卡位，或配合男攝影記者的要求。如 F7 無奈地說：「我就是用手機拍，所以我必須非常靠近那個講話的現場，當我很靠近的時候，他們就會說：『阿嬤，頭低一下！』，那我就識趣地

趕快蹲下。」

不過，F2 也坦言：「公民記者還是需有機動性，像女生行動力就不夠，男生摩托車騎了就走，那你說女生，像我又是職業婦女就更慢半拍。」F2 瞭解自己的侷限，所以對公民報導也只能量力而為。同樣有家累的 F6 也常婉拒一些公民新聞的採訪，「我還要養家活口，我還有兩個兒子要養，也要做家務，我常跟他們說：『我沒玩那麼大！』。」已婚的受訪者因須照料家庭，加上有些又是職業婦女，所以空閒時間相對有限，導致其報導多從身邊、熟悉的事物著手，也因此被質疑報導缺乏「新聞性」。

再者，有些受訪者亦提及「性別特質」會影響其報導，如 F13 憶起之前在【新頭殼】發表的「反服貿」文章，「我寫到我很害怕，寫到來到這裡我旁邊的人很害怕，我怎麼可能不怕之類，然後就有人說：『你們學生那麼怕幹嘛還要非法進入現場？』。」自認膽小的 F13 表示，雖然內心十分恐懼，但仍想見證歷史。「他們的心情沒有被記錄下來，我會很不甘心，所以我才用主觀的方式去寫。」即使遭到一些質疑，F13 仍不想掩藏自己女性化稟性，反而在新聞報導中加入「情感」，以和主流媒體的冷漠報導做出區隔。

女性受訪者多不諱言在採訪現場的情緒反應，但她們的報導並非都採用感性手法。如 F2 說：「採訪茶山的那個女人，我幾次掉淚，我的 partner 就說：『啊！慘了！你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必須調整寫作的方向。』我說那可不行，我的情緒是我的情緒，跟我們的製作是兩碼子事。」如同 F2 選擇以客觀方式進行公民報導，F9 也認為新聞應保持專業，女性化的書寫雖然感覺親切但較不正式，「新聞裡面不會有我，也不會出現ㄋ、ㄉ、ㄇ那些注音文，現在 WEnews 很多稿子都是這樣，但我不會那麼做。」

顯然，不是所有受訪者皆認同女性化書寫對新聞報導是有益的，反而有人認為那是一種阻力，應盡量避免。這顯示，婦女在新聞場域內性別資本的挪用，因人而異：有些女性因支持新聞的客觀性，而以為女性特質會妨礙其專業表現；有些則是反對新聞專業的「去人性化」，而肯定女性書寫的價值與意義。有關婦女在新聞場域所採用的策略，下面將會有更進一步的分析。

在此要強調的是，女性特質讓女性受訪者對採訪對象的遭遇較易感同身受，但在現場真情流露的同時，也易被視為「失態」或「非專業」。McNay (1999, p. 103) 曾指出，即使性別可以被重塑，但某些前反身性的面向卻是根深蒂固。對女性受訪者來說，比起無意識層面的超然態度，女性特質更易和意識層面的新聞書寫進行協商與挪用，這也導致婦女在採訪現場，其前反身性面向（如：落淚、害怕或感動）易讓她們的新聞表現失分。

除性別特質外，年輕的受訪者也指出，女性的外貌會影響其採寫工作，如 F16 說：「我主要用臉書去聯絡，我們都會講一些現在社會上發生的事啊、現在的民主運動。這些都比較好，尤其是蘋果日報的週刊，台灣也有，他們那時候也有採訪我，他們不想知道我的立場是什麼，不想要你講。他們想知道你的家人是什麼工作啊、你的背景、多少兄弟姐妹、有沒有男朋友，這些事讓我覺得蠻反感的。」F16 覺得女性參與公共事務，不是被評論「想出名」、「管太多」，不然就是被「炒作性別」。

在訪談期間正值太陽花學運的熱潮，有 3 位受訪者也表明對「太陽花女神」報導的反感，如關心性別議題的 F18 說，「在學運報導中，大家瘋狂推舉民主女神；有人太生氣就寫了《請你們把我們的外表還給我們》。那次迴響很大，一些澳門、大陸、台灣的網站和讀者都有分

享。」來自澳門的 F18 亦發現，不同平台對待女性的方式也不相同。

像《愛瞞日報》和《澳門政改咖啡檔》，裡面發起和參與討論的人，九成都是男性；管理員、總編輯、副總編輯等都是男性。有時，我也會看到他們和參與者一些非常政治不正確，讓我火大的話。例如對女性的調侃啦，女性政治人物外表的評頭品足啦之類。真正能夠產生影響力的都是男性，在他們的平台，目前只有很少數的女性參與，有些女性會投稿插畫，很少數像我寫評論的（F18）。

她意識到網路空間雖然允許女性自由發聲，但實際上女性的發言仍受到某種程度的侷限，像是不友善的言論環境。

綜合上述，我們可以發現女性受訪者在從事公民報導時，仍會遭遇女性專業記者所須面對的問題，包含女性的外貌、體型、性別特質，甚或家庭的勞務分配；這些性別因素都可能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其在公民平台上的表現。

#### 四、性別資本的挪用

儘管女性受訪者意識到「性別」易阻礙其從事公民報導，但女性經驗卻也是她們的有力資本，影響其對議題的選擇、和消息來源的互動、採用的報導形式，甚或對讀者的回應。

首先就議題的選擇，受訪者若是社會運動者，議題的選擇自然和其所從事的社運相關，如身為九五聯盟一員的 F11 對勞工議題特別關切。然而，受訪者若未參與社運，其所關注的議題則多連結至自身的性別經驗或性別角色。如關心性別議題的 F18 指出，「回顧我自己寫的文章和

專欄，跟我自己的非異性戀身份、對女性身份的覺察和身為澳門人等，都有很大關係。」因為自身的性別經驗，讓 F18 對社會上的性別歧視特別敏感，「看到原本泛濫著太多讓人憤怒的言論，就跳出來特別戰一下！」。而身為人母的 F2 也說，「因為女性嘛，我比較不想參與政治的事，所以也許是女性跟母性使然吧，我會比較偏向，比如說一些生態、環境的議題，像四分溪的封溪護魚。」這些受訪者所選擇的議題多受其性別化生存心態的影響，而偏向性別、食安、消費或環境等主題（見表二）。

其次，參與現場報導的女性受訪者，不論是否從事社運，皆強調在採訪時應尊重當事人的意願和感受。

你知道那些人的家人可能都死了，然後如果你為了報導一直去問，其實就是二度傷害。我不是很想這麼做，會先用聊天的方式，然後如果他們願意講再講，不想講就算了（F1）。

對方跟我分享，後來覺得那部分他不想公開，我覺得我們交朋友啊，如果人家有煩惱，我就撤啊…其實我覺得直接拿相機出來，那個真的像大砲一樣，是會傷人的（F6）。

我現在做的個案，媽媽受到父親的家暴…這樣等於把他們家的狀況，就如果之後傳出去也不太好，我就想那家暴的部分少一點（F12）。

在性別社會化的過程中，男性被教導成價值獨立、以自我和目標為導向；女性則是價值依賴，以他人和關係為導向，導致兩性發展出不同的道德思考和關切（Rodgers & Thorson, 2003）。當女性／公民記者進入新聞場域後，其女性化稟性也讓她們更願意關心採訪對象的需求，而非只是完成報導而已。

由於女性受訪者總是設身處地為採訪對象著想，傾聽他們的心聲，所以多和他們維持長久、良好的關係。如 F11 以為，公民報導對工運的影響力有限，反而是長期的人際互動才更重要，「因為勞資議題來的那個群眾，根本不會想說要勞動階級團結，我只能一邊協助他解決問題，一邊長期陪伴他，就是要慢慢改變。」在訪談中，多位受訪者提及，她們願意花更多時間和當事人溝通，以取得信任，因此她們和採訪對象的關係就如同朋友般。

再則，除了「將心比心」外，女性受訪者也比較容易察覺專業記者所疏忽的面向，且會注意更多細節。如 F6 指出，「我比較像傻大姊，大家可能覺得比較無害…我的第一篇公民報導是寫那個集集山上的鎮國寺，兩年前那時候辦了國際大法會，住持希望有記者來報導…我後來的主題就是弄得很有趣，那個就是阿彌陀佛類似跳舞念佛的東西，大家都說很有趣，跟那個記者寫的不一樣。」F14 也分享報導經驗，「我覺得對方比較信任我，然後他願意讓我到他家，去拍他爸爸死掉前睡的那張床，那我覺得一般記者反而是因為工作的關係，他沒有辦法寫這些生活化細節，然後我反而還比較自由，還可以去寫說這是他生前用的拐杖。」女性／公民記者因女性資本（即女性身體）較易卸下採訪對象的心防，加上她們對人性的關切，也讓她們注意到事件的不同層面，而非只是單純地呈現事實。

在訪談中，女性受訪者多不諱言，她們的報導總是帶有主觀的立場。如 F1 說，「那時候大埔案去採訪張藥師，聽他講話，怎麼說，因為他那時候一直在為這件事情奔波，然後你看他就是一直哭，你就會被那種氣氛渲染，就會覺得怎麼會發生這種事情，然後你就會想幫他。我覺得我們一定會有立場！」F14 也指出，「我覺得公民新聞比起一般新聞更帶有感情的悸動。除了用客觀的角度來描述文章外，比起一般新聞

更具有社會影響力！」雖然不是所有受訪者都會採用女性化書寫，但她們皆表示公民新聞不同於專業新聞，允許她們表達立場，而立場並不違反「真實」原則。

最後，女性受訪者普遍重視讀者的回應。如 F2 表示，「說不 care 是騙人的，我會去看他怎麼留言。有人留言，我就必須要回答，這是一個公民記者最起碼的一個禮貌。」F5 也說，「【上下游】上面有比較多回應和讚數，我會去看看大家的想法。雖然久久寫一篇，還是會在意瀏覽數，就盡量想把議題的力量集中，因為我們沒有很多時間，所以寫一篇希望達到某種效益，像是引起話題，讓大家關心。」身為 WEnews 的公民記者 F10 也表明其在意瀏覽數，「有人留言都會互相討論，畢竟分享出來的訊息也是經過採訪、拍照後才撰文。」這些女性受訪者多願意分享自己對讀者的態度，也表明期待透過和讀者的互動來提高文章的品質和擴大影響力。

由此來看，女性的性別資本對公民記者來說，並非全然是負面資本。它不僅讓女性更關懷與切「身」或生活相關的議題，同時也讓她們更富同理心，願意深入瞭解採訪對象的遭遇並為其發聲。

## 五、在新聞場域的因應策略與轉機

新聞場域作為整個文化生產域的一環，雖然受到外在勢力的影響，但仍有其內在的運作規則，尤其是「新聞定信」（journalistic doxa）——即一套被視為理所當然、未被質疑的專業信念，用來指導新聞實踐（Schultz, 2007, p. 194）。然而這套專業所標榜的客觀中立和女性化稟性並不相容，導致婦女進入新聞場域必須發展出因應對策：或是順從場域的要求，或是進行協商，或是挑戰規則。不過，這三種策略並非絕對

互斥，也可能隨著情境或議題的改變而同時或交替使用，以增加婦女在場域內的機會。

### （一）順從場域的要求

為了順利成為場域的一員，有些受訪者努力累積新聞資本，以轉換成更高的象徵資本。有 3 年公民記者經驗的 F8 說：「10 多年前，我就為聯合報副刊寫作，一字一元…。現在我退休了，想好好利用剩餘人生為社會做些什麼，才會想當公民記者。」她在 WEnews 平台很快便取得簽約記者的身份，即使從事美食報導，但仍強調公正誠實報導的重要性。「像現在有食品安全問題，這是一個壓力，報導不是用來玩或賺錢的，是有社會責任…我們去一家餐廳採訪，不可以因為不好意思就把不好吃說成好吃，有時現場會很尷尬，其他比我早進去的公民記者便會幫我圓場說是我對自己的要求比較高。」由於她對報導的自我要求，之後被觀光局邀請擔任「台灣有夠讚」的考評委員。她覺得公民記者必須自律，才能受人尊敬。

F8 的媒體經驗不僅讓她順利進入新聞場域，也實現了退休抱負——用新聞報導來改善社會，甚至匡正美食報導等於業配新聞的說法。在場域內，她認同專業新聞的要求，採用男性化的資本（如：實話實說），讓自己的報導符合專業水準而得到肯定。

其次，缺乏媒體經驗的受訪者除了參加新聞培訓課程外，有些也會主動向男性前輩或男性公民記者請益，以累積報導技巧。如 F1 憶起剛學新聞報導的情形，「因為我不是本科系，所以我不太知道怎麼寫，剛好新頭殼有很多長官就很願意教我們，比如倒三角、導言什麼等，我們就自己抓，他們會糾正，然後我們再改。」F1 就這樣一面學習；一面累積新聞資本。F2 也說：「寫稿頭腦不夠機靈，是強求不來的…，我

主動到公共電視請建雄哥教我如何寫稿、如何配音，雖然我不是正科出身，可是我們也要盡量學到像，像大暴龍、阿 Ben 就很厲害，他們也是朝這個方式去做。」她很開心，自己的作品比起兩年前更進步。

然而，公民記者畢竟不同於專業記者，雖然參與公民報導需要一些基本的數位／媒體技巧，但特殊的專業知識（如：畜牧、農業）也能讓其報導比專業記者更正確且更深入。例如，擁有畜牧專業的 F5 說：「其實我們農食的話，它牽扯到很多是有關科學，像科學上它研究是什麼，我們還是要去查證這些資料，盡量不要引用報章雜誌的。因為像食安，很多記者都是用小道消息，沒有經過正確的查證！」她自認比專業記者更嚴謹地查證資訊的來源與正確性，藉此來推動她的理想——農食教育。而她的專業知識不僅協助其從事公民報導，也讓她能和專業記者爭奪議題的詮釋權。

## （二）善用女性特質，在場域內進行協商

有些受訪者標榜與人為善，凡事持正面報導。身為人母的 F6 說：「我的個性比較像媽媽啦，我喜歡用關懷的角度去寫，寫一些身邊的議題…。我也是佛教徒，剛開始做公民記者，我也用佛教徒修行的那個角度，就是我護生，用這個參與環境保護，跟大家結善緣。」F6 將女性特質與佛教信念結合，藉由關懷、善念來看待周遭的人事物，導致其報導被批評「有點像宣傳」，但她覺得自己是用生命在寫新聞，而非中立的角度。為了讓報導獨樹一格，F6 善用女性特質，發展出自我風格，「我就是照講話的口氣去寫，所以你只要看到這個文章的調性、講法、就知道是我寫的。…然後我絕對不用新細明體，因為那沒有生命。好歹我學過美工，至少要用有血有肉的標楷體。」她對文章的字體、排列都有強烈要求，以體現自己的存在。

其次，有些受訪者也常選用感性手法來進行公民報導。有傳播背景的 F13 覺得自己是感性之人，在反服貿期間，她決定用親身經歷來寫歷史。她說：「每一家媒體都是客觀冷冷的事實，呈現在你的面前。他們寫的客觀報導都沒有辦法改變人的想法，我才選擇用主觀的方式去寫，反正情感很容易影響群眾。」未來計畫從事新聞工作的 F13 認為，自己並不排斥客觀新聞，但當客觀報導無法改變社會時，感性報導或許是另一種選擇。儘管如此，她對自己未採用合法性的報導手法也感到不安，「這其實是不好啦，有點個人因素，覺得這些人的想法應被記錄下來，才用這種方式。」

### （三）挑戰場域的規則

有些受訪者不僅意識到場域的限制，甚至意圖改變主流的意識型態或性別運作。如 F7 從事公民報導後，也開始質疑公權力的行使。

像最近在中正紀念堂基督教做的那個 2014 活力運動，就是講那個爸爸要怎樣做好爸爸的運動，但我居然看到有警察在那邊！這是一個很平和的活動，看到親子在那邊，為什麼要有這麼多警察？原來說有同志來抗議說：『為什麼要一男一女組成一個家』？那些警察正好就在現場就把他們隔開。我就寫了一篇《為什麼警察要介入》，這是兩個不同的價值、多元的價值觀，那警察在那邊說：你不可以來，我覺得社會如果不讓他們有對話的機會，永遠就會變得各說各話。…像現在的警察議題，你站出來不讓甲發聲或不讓乙發聲，你的點在哪裡？為什麼是他可以被聽到，其他人卻不行？（F7）

她認為，目前的言論和媒體都被少數人控制，若想看清事情的來龍

去脈，必須有更多人為了正義站出來，將他們所看到的寫出來，才能讓大家以更多元的方式認識這個世界。不同於其他公民記者，F7 考量自己的年紀和能力，改以「一刀未剪」的手法來製作公民報導。「我覺得如果要剪成兩三分鐘已經就有人在做了，那些主流媒體的記者、或是說獨立媒體他們都有在做，我覺得我能做的是什麼？就是把我看到的東西很忠實地紀錄下來，然後放在網站上，我覺得這是保留一個現場的最好工具。」她同時也做剪報，將重要的訊息蒐集起來，加上超連結再分享出去，F7 試圖以提供素材的方式來擴大其影響力。

其次，有些參與社會運動的女性受訪者則質疑，專業報導會弱化弱勢者的聲音，而主張站在弱勢者的立場將原委說分明。例如，九五聯盟成員之一的 F11，因不滿新聞被媒體、財團甚或國家所壟斷，而採用社運立場從事公民報導，「有一次我們在美髮店前面開記者會，因為他們是血汗髮廊嘛，然後那個小妹妹當學徒一個月六千塊，月休四天這樣子。結果媒體記者就跑來跟我們說，你們這個場實在太醜了，你們到那邊去，所以我們又移到那邊。事後，我們就覺得很窩囊，為什麼要被他們這樣指揮來指揮去？！…如果說我們可以自己產出新聞的話，我們就可以更清楚地表達我們的意見。」雖然有人質疑她的報導不夠平衡，缺乏資方的意見，但她強調這是因為社會忽略了勞工利益，「我的責任就是把立場說清楚，提供足夠證據去說服觀眾，公正客觀這個東西反而不重要。」她希望透過公民報導，「讓人家知道還有其他思考方式，就可能拉動那個中間還沒有定論的人。」

此外，有些女性受訪者則注意到整個社會和新聞場域對性別的偏見，而希望透過公民報導指出此問題，讓大家對性別有更多認識和反思。如 F16 說，「我是女的，希望能夠鼓勵更多的女性站出來，因為現在我叫『父權資本主義』。我覺得現在資本主義讓女生的價值就在她的

身材啊，她的外表。妳有沒有一個老公啊？妳找不找得到一個男人？這些是她唯一的價值，所以這個概念讓很多的女人去隆乳、減肥、買很多美容產品，所以我覺得如果更多女性出來的話會建立她們另外一種價值，真正的價值不只是她的外表。」F16 強調，人人都是記者，都是社會的一份子，應該關心周遭的事物，而身為女人，自然必須出面對抗媒體對女性的商品化。

身為學者的 F15 偶爾也在苦勞網的公共論壇上發文，她分享一段一篇歷經三部曲的經驗，「我剛開始對王家的興趣，其實和居住權沒什麼關係…因為我看到很多青年，當中不乏有我認識的同志社運青年，那不是一種義氣上的挺而已，那是一種幾乎是血淚、哭泣、咆哮地去挺。」她好奇同志成員為何會去支持一個父慈子孝的地主家庭，於是寫了一篇五千字的評論，質疑社運的目的不是為了維護生存，而是支持「祖宗六代、兩百年都居住在這裡」的主張。之後，它又將其改寫成萬言的會議論文，但在發表當日，王家聲援者到會場抗議；最後，她又將它改寫成一篇兩萬字的專書論文。這三部曲說明，F15 已將新聞資本轉換成學術資本，雖然不是一開始就有此打算，但從事新聞評論的確讓她可以對事件不斷發想，而拓展成長篇有深度的論文。同時，對大眾來說，一般人減少接觸學術期刊，但卻可以從苦勞網閱讀到另類的觀點，而有不同的想法。

從訪談中可以發現，在新聞場域的限制底下，女性受訪者仍擁有自主性，可以根據其對場域規則、所在位置和性別運作的瞭解，以及擁有資本的多寡來決定其行動，或是認同新聞專業的要求，學習男性化的報導方式；或是利用女性特質，發展自我的報導風格；甚或進一步質疑社會／新聞背後的意識型態運作。每位受訪者不僅對公民報導有不同的想像與堅持，也試圖在場域中實現其理想，或將其延展成其他場域的資

源。

不過值得注意，女性受訪者在場域的實踐並非一成不變，常隨著情境或議題的變化而改弦異轍，呈現出多樣、動態的新聞實踐，同時也建構出多元的女性主體性。以 F7 為例，她剛開始接觸公民新聞只是幫忙記錄和推廣，但多次參與現場報導後卻會質問：「這個社會怎麼是這個樣子？」，她的報導也從簡單記錄到廣泛蒐集各種言論，以對抗主流媒體的單一論述，而她自己也從年長的退休者，轉變為關懷社會、積極參與、有話直說的公民記者；在從事公民報導之際，她也做性別，成為「不一樣」的年長女性。

## 伍、結論

為瞭解女性業餘者進入新聞公民平台內其新聞賦權的可能性，本文調查 18 位女性受訪者，結果有三項發現。首先，女性參與新聞公民平台的動機不全然是為了新聞賦權，其中有些人甚至不太瞭解新聞的運作，只是單純想分享資訊。在新聞場域內，來自不同背景、擁有不同資源的婦女所採取的位置也不盡相同：或坐入「公民記者」，參與現場採訪；或「評論者」位置，對時事進行針砭；或「參與者」位置，對社會事件表達關切之意；或「分享者」位置，傳遞和共享訊息。而她們在不同位置所進行的各種新聞實踐，不僅能提高女性在新聞場域的能見度，也有助於提供多元的女性觀點。這點與國外研究的發現不謀而合，但本研究更進一步顯示：婦女並非同質性的女性群體，她們之間在公民平台的賦權使用上存在著差異。由於每位婦女的社會處境不同，所面對的壓抑自然也不同，導致她們會根據自己的生存心態和需求，以不同方式使用公民平台去達成目的，譬如：F4 為了食安而分享訊息、F11 為了工運

而發聲、F15 為了性／別平權而批判），不僅發揮能動性，也發展出不同的賦權形式。這也說明賦權涉及個人的批判自覺程度，婦女若越能察覺其所處的壓抑結構（不論是個人或社會層次），就越可能利用公民平台去爭取政治機會，尋求改變。

其次，儘管新聞公民平台可以讓一般婦女擁有新聞賦權的機會，但其參與新聞行列，仍須面對女性專業記者所遭遇的問題，包含女性的外貌、體型、女性特質，甚或家庭的勞務分配等，這些性別因素都可能限制並左右她們在公民平台上的表現。其中，有些年長女性甚至伴隨年齡（如：視力衰退）、家庭所帶來的「三重」打擊，而無力採用專業的報導技術（如：F6 改以文字為主；F7 則採用「一刀未剪」的手法）。以往的婦女賦權研究較偏重新科技如何為女性帶來改變的契機，而忽略網路科技作為民主工具，雖然具有解放的潛力，但它並非在真空狀態下運作。當社會條件未改變時，性別規範的象徵暴力、社會結構的性別／年齡不平等、以及勞動市場的性別分工仍會持續影響科技使用者，以致社會轉換的空間變得相對有限。

最後，性別化生存心態並非自動複製女性的附屬性，而是在進／出場域之際，不斷和場域的規則、資本及位置進行協商。也就是說，婦女的生存心態會因為經驗不同的場域要求（如：家庭、新聞現場、公民平台），而有所調整，甚或發展出多樣的稟性（*diverse disposition*; Schoch & Ohl, 2011, p. 204）。Bourdieu 早先低估了社會結構的複雜性，以致忽略社會是由不同且異質性的場域所組成；場域彼此之間的規範、價值並非一致，有時甚至互相衝突矛盾，導致依賴場域而生的生存心態也無可避免地變成反復無常（*versatile*）且斷裂（Sewell, 1992）。McNay（1999, pp.107, 110）指出，男／女性位置在不同場域中也是如此，經常是模糊且不一致，因此藉由跨入和其性別化稟性不相符的場域，有助

於讓性別化生存心態「去穩定化」，進一步喚起性別反身性（gender reflexivity）質疑性別規範對主體的箝制。

之前新聞場域一直由男性主宰，雖然商業化和新科技的引進已改變場域的某些特性，但專業客觀性仍享有象徵的合法性（Djerf-Pierre, 2007）。當女性業餘者進入該場域，勢必面臨女性化稟性和場域要求之間的衝突與磨合。一方面，在新聞場域內，性別化生存心態會影響婦女的新聞表現；不論是現場採訪、議題選擇或和採訪對象／讀者的互動，婦女都會不由自主地受制於過往的形體化經驗，譬如：F2 看到受訪者的哭泣而潸然淚下；F14 同情無助的拆遷戶而自願為其報導；F18 因網友的讚數而倍感自信。這些女性化的反應在場域內，易被視為「非專業」，但卻是婦女從小到大一再被灌輸的稟性，以「前反身性」的方式體現在其身上。雖然婦女可能同時交錯展露其他的稟性（如：F2 仍堅持以專業手法完成公民報導），但女性身體往往會讓女性化的反應在專業領域裡被放大檢視而遭質疑。這或許也是為何過去有關婦女與新聞研究易將新聞表現與男／女性特質劃上等號之因。不過，藉由 Bourdieu 的「生存心態」觀點，有助於說明性別／特質雖然是建構的、可以被重塑，但某些「前反身性」的面向（如：落淚、害怕、同情）較難被改變，因為性別運作除了透過制度化機制、文化論述外，也會經由無意識的方式鑲嵌在身上，發揮權力效果。

另一方面，斷裂的性別化生存心態也能成為婦女能動性的來源（Wade, 2011）。本文發現，女性受訪者藉由跨進和其稟性不相容的新聞場域，反而更能察覺場域的限制並產生反身性的自覺，主動和場域的規範進行協商：或學習男性化思維，培養專業資本；或善用女性化稟性作為戰術的資源；或質疑社會／性別的意識型態運作。這顯示，婦女並非以內化的女性經驗一再複製其行動，而是具有性別反身性，能在新聞

場域中以獨特、創新的方式進行實踐，除評估情勢、行動後果及與他人的關係外，她們也能和性別規範進行協商，將性別轉換成有力的資本，重塑其性別化生存心態。這也是過去 Bourdieu 所忽略之處，雖然婦女所採取的行動可能無法改變整個結構，但藉由性別化生存心態和場域之間的關係，有助於我們瞭解婦女的能動性，以及性別主體性如何透過多元、動態的實踐而不斷地被形塑出來。

然而，在此也須承認，本文的女性受訪者擁有一定的文化資本（如：教育程度、專長、敘事能力），是否因為屬於「智識階級」，所以較能察覺場域之間的衝突，在新聞場域內表達能動性，並獲得新聞賦權的機會？是以，未來研究也應擴大調查不同階級、族群的女性如何近用新聞公民平台，將更能瞭解性別如何結合其他面向影響一般婦女的新聞賦權。

## 參考書目

- 孫志硯（2007）。〈論述、權力與報業攝影記者職業性別隔離的維繫〉，《新聞學研究》，91: 125-170。
- 趙仲定（1987）。《台北市新聞記者性別分化及性別階層化之研究》。私立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蘋（2004）〈新聞專業中的性別政治：媒介組織對女性記者及其報導的影響〉，《新聞學研究》，81: 85-123。
- 賴維真（2003）《女性新聞工作者勞動經驗之研究》。國立中正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論文。
- Al-Natour, M. (2012). The role of women in the Egyptian 25th January revolu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13(5), 59-76.
- Atton, C. (2008). Alternative media theory and journalism practice. In M. Boler (Ed.), *Digital media and democracy: Tactics in hard times* (pp. 213-227).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Bonner, F., & McKay, S. (2007). Personalizing current affairs without becoming tabloid: The case of Australian Story. *Journalism*, 8(6), 640-656.

- Bou-Franch, P. (2013). Domestic violence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media: The case of citizen journalism, *Gender and Language*, 7(3), 275-302.
-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NY: Greenwood.
-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1992). *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0). *Pascalian meditations*. Oxford, UK: Polity Press.
- Bourdieu, P. (2001). *Masculine domination*. London, UK: Polity Press.
- Bowman, S., & C. Willis. (2003). We media. 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journalism. (online) The Media Center at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Reston, VA. Retrieved June 25, 2011, from:  
<http://mediacenter.org/mediacenter/research/wemedia>.
- Chambers, C. (2005). Masculine domination, radical feminism and change. *Feminist Theory*, 6, 325-346.
- Chambers, D., Steiner, L., & Fleming, C. (2004). *Women and journalism*. London, UK: Routledge
- Corrêa, E. S., & Madureira, F. (2009). Citizen journalist or source of information: An exploratory study about the public's role in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within leading Brazilian web portals. Retrieved from:  
<http://online.journalism.utexas.edu/2009/papers/SaadMadureira09.pdf>
- de Bruin, M. (2000). Gender, organizational and professional identities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1(2), 217-238.
- Djerf-Pierre, M. (2005). Lonely at the top: Gendered media elites in Sweden. *Journalism*, 6(3), 265-290.
- Djerf-Pierre, M. (2007). The gender of journalism: The structure and logic of the fie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ordicom Review*, 81-104. — Jubilee Issue.
- Franks, S. (2013). *Women and journalism*. New York, NY: I. B. Tauris & Co Ltd.
- Gallego, J., Altes, E., Canton, M. J., Melus, M. E., & Soriano, J. (2004). Gender stereotyping in the production of news. In M. de Bruin & K. Ross, (Eds.). *Gender and newsroom cultures: Identities at work*, (pp. 119-142). Cresskill, NJ: Hampton Press.
- Gill, R. (2007). *Gender and the media*.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Gheytanchi, E., & Moghadam, V. (2014). Women, social protests, and the new media activism in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Modern Society*, 40(1), 1-26.
- Goode, L. (2009). Social news, citize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New Media & Society*, 11, 1287-1305.

- Gurumurthy, A., & Chami, N. (2014). Gender equalit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current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IT for Change & BRIDGE. Retrieved from <http://www.eldis.org/vfile/upload/4/document/1409/Gender%20and%20ICTs%20briefing%202014.pdf>
- Huppatz, K. (2009). Reworking Bourdieu's "capital": feminine and female capitals in the field of paid caring work. *Sociology*, 43(1), 45-66.
- Huppatz, K., & Goodwin, S. (2013). Masculinised job, feminised jobs men's 'gender capital' experiences: Understanding occupational segregation in Australia. *Journal of Sociology*, 49(2-3), 291-308.
- Huws, U. (2008). Women, participation, and democracy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K. Sarikakis, & L. R. Shade, (Eds.).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pp. 45-56).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ing.
- Kabeer, N. (1999). Resources, agency, achievements: Reflections on the measurement of women's empowerment.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0, 435-464.
- Keller, J. M. (2011). Virtual feminism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3), 429-447.
- Lavie, A., & Lehman-Wilzig, S. (2005). The method is the message: Explaining inconsistent findings in gender and news production research, *Journalism*, 6(1), 67-69
- Lofgren-Nilsson, M. (2009). 'Thinkings' and 'doings' of gender: Gendering processes in Swedish television news production. *Journalism Practice*, 1-16.
- Marinescu, V. (2008). Communication and women in Eastern Europe: Challenges in reshaping the democratic sphere. In K. Sarikakis & L. R. Shade (Eds.),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inding the gap* (pp. 276-29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Marzocchi, O, & Bonewit, A. (2015). *Empowering women on the Internet*, European Parliament, Policy Department Citizens' rights and constitutional affairs, Brussels.
- McCall, L. (1992). Does gender fit? Bourdieu, feminism, and conceptions of social Order. *Theory and Society*, 21(6), 837-67.
- McNay, L. (1999). Gender, habitus and the field: P. Bourdieu and the limits of reflexivity.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16(1), 95-117.
- McNay, L. (2000). *Gender and agency: Reconfiguring the subject in feminist and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McNay, L. (2003). Agency, anticipation and indeterminacy in feminist theory. *Feminist Theory*, 4(2), 139-148.
- Mellor, N. (2010). More than a parrot: The case of Saudi women journalists. *Journal of Arab & Muslim Media Research*, 3(3), pp. 207-222.
- Miller, B. L. (2014). Symbolic capital and gender: Evidence from two fields. *Cultural Sociology*, 8(4), 462-82.

- Milivojević, S. (2016). More platforms, less freedom: How new media reproduce old patriarchal structures. *New challenges of freedom of expression: countering online abuse of female journalists*.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pp 31-33.
- Newsom, V. A., & Lengel, L. (2012). Arab women, social media, and the Arab spring: Applying the framework of digital reflexivity to analyze gender and online activ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Women's Studies*, 13(5), 31-45.
- Nip, J. Y. M. (2006). Exploring the second phase of public journalism. *Journalism Studies*, 7, 212-236.
- North, L. (2004). Naked women, feminism, and newsroom cultur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1(2), 54-67.
- North, L. (2009). Reject the F-word: How 'feminism' and 'feminists' are understood in the newsroom. *Journalism*, 10(6), 739-757.
- North, L. (2014). Still a 'Blokes Club': The motherhood dilemma in journalism. *Journalism: Theory, Practice and Criticism*.
- Parameswaran, R. (2005). Journalism and feminist cultural studies: Retrieving the missing citizen lost in the female audience. *Popular Communication*, 3(3), 195-207.
- Radsch, C. C. (2013). Unveiling the revolutionaries: Cyberactivism and women's role in the Arab uprisings. Retrieved from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52556](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252556)
- Radsch, C. C., & Khamis, S. (2013). In their own voice: Technologically mediated empowerment and transformation among young Arab women. *Feminist Media Studies*, 13(5), 881-890.
- Robinson, G. J. (2008). Feminist approaches to journalism studies: Canadian perspectives. *Global Media Journal - Canadian Edition*, 1(1), 123-136.
- Rodgers, S., & Thorson, E. (2003). A socialization perspective on male and female report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3(4), 658-675.
- Ross, K. (2001). Women at work: Journalism as en-gendered practice. *Journalism Studies*, 2(4), 531-544.
- Ross, K. (2007). The journalist, the housewife, the citizen and the press. Women and men as sources in local news narratives. *Journalism*, 8(4), 449-473.
- Powell, A., & Sang, K. (2015). Everyday experiences of sexism in male-dominated professions: A Bourdieusian perspective. *Sociology*, 49(5), 919-936.
- Sadan, E. (1997). *Empowerment and community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eople-focused social solutions*. Tel Aviv, IL: Hakibbutz.
- Santamarina, D. R., Ayerdi, K. M., & Fernandez, S. P. (2015). The feminisation of journalism studies: An analysis of the Spanish case. *Revista Latina de Comunicación Social*, 70, 566-583.
- Schoch, L. (2013). Feminine writing the effect of gender on the work of women sports journalists in Switzerland.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5(6), 708-723.

- Schoch, L., & Ohl, F. (2011). Women sports journalists in Switzerland: Between assignation and negotiation of roles.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8, 180-208.
- Schultz, I. (2007). The journalistic gut feeling: Journalistic doxa, news habitus and orthodox news values. *Journalism Practice*, 1(2), 191-207.
- Sewell, J. W. H.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1-29.
- Skeggs, B. (1997). *Formations of class and gender: Becoming respectable*. London, UK: SAGE.
- Swartz, P. (1997). *Culture and power: The sociology of Pierre Bourdieu*.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choch, L., & Ohl, F. (2011). Women sports journalists: Between assignment and negotiation of roles, the Swiss case. *Sociology of Sport Journal*, 28(2), 189-208.
- van Zoonen, L. (1998). One of the girls?: The Changing Gender of Journalism. In C. Carter, G. Branston, & S. Allan (Eds.), *News, Gender and Power* (pp. 33-46). New York, NY: Routledge.
- Volčič, Z. (2008). Media, identity, and gender: Tracking feminist media and journalism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Medijska Istrazivanja, Croatian Journal for Journalism and the Media*, 14(1), 5-20.
- Wade, L. (2011). The emancipatory promise of the habitus: Lindy hop, the body, and social change. *Ethnography*, 12(2), 224-246.

# Journalistic Empowerment: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Women and Citizen Media/ Citizen Journalism

Yu-Ling Lin \*

## ABSTRACT

In view of gendered habitu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citizen media and citizen journalism can empower women. Based on 18 female respondents, there are three major findings. First, women's motivations in citizen journalism are not entirely for journalistic empowerment, some of them do not even know the journalistic operation, but simply want to share information.

Second, citizen journalism platforms not only empower women, but also restrict them. Women still face the problems of female reporters, such as the appearance, size, femininity, even gendered division of household labor. These gendered factors are able to limit and influence their performance of citizen journalism.

Finally, women's gendered habitus do not automatically reproduce their subordination, when they go in/out the journalistic field. Women constantly negotiate with the rules, capitals and positions of the journalistic fields.

**Keywords:** women, citizen journalists, gendered habitus, journalistic field, journalistic empowerment

---

\* Yu-Ling Lin is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i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